

● 陈嘉庚丛书

推荐陈嘉庚

名著

《南侨回忆录》

《陈嘉庚丛书》

推荐陈嘉庚名著《南侨回忆录》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集美学校委员会合编
集美校友总会

曾昭铎

1994年6月

陈嘉庚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陈嘉庚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陈嘉庚画册》题词手迹



1950年陈嘉庚回国前夕摄于新加坡。

引 言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华侨领袖，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具有雄图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曾相继赞誉其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位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伟人。这是对陈嘉庚光辉一生的最好评价。

陈嘉庚先生生前对人类社会作出过许多贡献，所著《南侨回忆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这部近四十万言的名著，是陈嘉庚1942年至1945年避难爪哇期间，在敌人重重围困的环境里，置生死于度外，秘密创作而成的。它简要叙述了自青少年时代起至年过古稀时这段漫长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同时着重详尽记述了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即抗战期间，南洋千百万侨胞，如何与祖国同胞一道并肩战斗，同甘苦共患难，出大钱献大力，赤诚支援祖国抗战；以及国难期间华侨代表如何肩负华侨重托，翻山过海，千里迢迢，回国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对祖国坚持八年持久抗战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因此，绝不能把《南侨回忆录》单纯看作是陈嘉庚个人传记，实际上它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现代华侨奋斗史，一部有血有肉的南洋华侨支援抗战史，一部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教材，是陈嘉庚先生几十年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的智慧结晶，它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份异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陈嘉庚先生名著《南侨回忆录》的成功出版和广泛发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廿世纪四十年代，它曾帮助海外侨胞

和国内同胞正确认识重庆和延安两个不同地区、不同制度和两种不同抗日态度的区别，从而引导人们通过对比，作出相应的判断和选择。如今历史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1994年又适逢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人们可以藉此难得机会，在重点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基础上，再仔细阅读一下《南侨回忆录》，必将有助于继承和发扬陈嘉庚一生所努力追求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将陈先生生前所无限热爱的祖国和家乡建设的更加繁荣和美好。

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李远哲先生对《南侨回忆录》在九十年代重新出版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尽管《南侨回忆录》是作于半个世纪前，尽管作者陈嘉庚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陈嘉庚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在今天的世界，陈嘉庚精神正在不断地、越来越多地发挥着对教育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同样是不朽的，它不但有供研究这位文化教育伟人的生平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学习和发扬陈嘉庚精神现实意义。”

+

目 录

- 一、陈嘉庚撰写《南侨回忆录》始末 (1-10)
- 二、陈嘉庚领导华侨 支援祖国持久抗战..... (10-17)
- 三、陈嘉庚回国考察 敦促国共团结合作..... (17-38)

一、陈嘉庚撰写《南侨回忆录》始末

1941年12月1日，日本政府与军方举行御前会议，商讨远东局势及其对策。认为要摆脱当前在中国进退两难的困境，必须向南推进，征服南洋及太平洋各国，切断中国的经济来源，夺取南洋各地丰富的橡胶、锡、铁矿石、石油等战略物质，进而“称霸”亚洲。为此必须不惜冒与中、美、英、荷等国同时为敌的风险，立即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

12月8日凌晨，“轰轰轰”三声巨响，惊醒了居住在新加坡“怡和轩”的陈嘉庚。他起身往窗外一望，只见外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警笛齐鸣。敌机轰炸新加坡，日寇向英国开战了。

陈嘉庚这时的心境异常复杂：敌人疯狂南侵，东南亚各国人民和南洋华侨必然要遭受惨重损失，令人痛心。但从此祖国抗战有了同盟军，不致孤立，最后胜利必属我，又令人振奋。

战争一开始，英国在马来亚海面的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击退”号被炸沉，日军迅速在马来亚登陆，并步步进逼，而英军却节节败退，马来亚难保，新加坡告急。新加坡人民和华侨抗敌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武装保卫新加坡。

英总督迫于危险局面和舆论压力，直到战争开始一星期后，才请求陈嘉庚出面领导华侨，组织抗敌动员工作。陈嘉庚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看穿了英政府没有抵抗的决心。但新加坡华侨斗志昂扬，纷纷请战。为了和他们站在一起，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才同意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主席。在广大华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敌宣传、组织等动员工作，给新加坡人民和华侨极大

鼓舞。

不出陈嘉庚所料，1942年1月底，日军已占领马来亚全境，英国已将柔佛——新加坡大桥自动炸断，将军港防御工事和油库自动毁掉，许多新式武器填入大海……种种事实表明，英国已无意保卫而有意放弃新加坡。

在友人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下，陈嘉庚才决定离开新加坡，并抓紧将南侨总会、闽侨总会等帐务一一安顿就绪，将寄存中国银行支援祖国抗战大笔汇款，及维持集美学校经费托友人立即汇出。于二月三日清早在刘玉水等几位友人陪同下乘小船匆匆离开新加坡。临行前还来不及告诉家里人。

(二)

离开了新加坡，小船将驶向何方？祖国虽好，但国民党当局已不容他立足，此路已不通，想回也回不了。危难中的陈嘉庚，只好就近避向苏门答腊的淡美那。准备将印尼作为中转站，必要时再转向澳洲或印度。但是这个计划后来也落空了，因为荷军望风而逃，日军在爪哇推进迅速。陈嘉庚刚从淡美那到马老白，准备前去的巨港却已沦陷。从此陈嘉庚只好在印尼华侨及集美、厦大校友陪同和掩护下，在爪各地辗转避难。从马老白、直务、吧城、芝拉札、梭罗……。经过连续几个月的颠沛流离，于同年8月来到东爪哇的玛琅。但这时的陈嘉庚已被敌人四面围困，成为搜捕的首要对象。

早在日寇南侵之前，日本“企画院”（日本政府所设专为侵略他国的机关）于1939年出版了一本《华侨研究》一书，其中一节对陈嘉庚作了专门论述。其大意是：若将陈嘉庚除外，则华侨的抗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均无法考究。他是福建人，在世界经济恐慌前，其经济力曾称霸马来亚。之后其势力仍不

稍减，社会地位及声望依然独步一时，对全华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担任南侨总会主席和难民救济会主席以后，奔命于抗日运动和排斥日货。在华侨抗日阵营中担任指挥工作。他告诫华侨应遵守当地法律，维护中英友好。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即致电严厉谴责，逃出重庆后，即强硬通电蒋介石要求逮捕法办。……综上所述，陈嘉庚实为南洋抗日之巨头，其风度、手腕及“抱拥力”，在南洋是独一无二的，其地位是南洋的蒋介石。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南洋华侨状况，以及对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已调查得一清二楚，并将他列为“南洋抗日之巨头”。只是当时新加坡和马来亚为英国所管辖，华侨力量又大，日本人对陈嘉庚虽恨之入骨，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而今，南洋各地已基本落入日军手中。时机已到，敌人便加紧搜捕。在南洋特别在爪哇各地到处布下天罗地网，派出宪兵队、警探、奸细，对所有车站、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进行严密监视，对每个过往行人逐个盘查，稍有嫌疑，立即扣押。陈嘉庚避难时既无印尼居民身份证，又不懂印尼语言，危险性就更大。

避难途中，在吧城，挚友庄西官刚刚安顿好陈嘉庚，庄的橡胶园即被洗劫一空，而后再遭日军传讯，至今生死不明。

在日惹车站，陪同陈嘉庚的几位校友，买好车票进站，突遇日本宪兵盘查旅客身份证。如果临时避开，反引人注目。他们只好硬着头皮，乘宪兵忙于检查之际，随人流一涌而过。而垫后的廖天赐却被拦住，好在刚好他有身份证，得以脱险而过。

为了保护陈嘉庚的安全，集美校友郭应麟、廖天赐及郭夫

人林翠锦和厦大校友黄丹季、陈明津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费尽心机，想出种种办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寻找几处既安全又合适的住所。住所关键是能够保密，要地处偏僻不易被敌人发觉的地方。同时要尽可能让校主住得舒畅些，还要便于随时机动搬迁。校友们一连找了几个地方：如玛琅巴兰街四号屋，位于大街小巷之间，这里气候宜人，后面有条河流，两岸有椰林；又如玛琅巽勿佐村晦时园，它山距峇株埠三公里，园外左右有高山、园后有小山、山上有树林。园内周围有无柱走廊，还有花园、果园、鱼池。业主原为荷兰人，已人去楼空，无外人杂居，校友们已向当地管理机关办理了租用手续。这些住所陈嘉庚都很满意。

为了便于掩护，还要弄人“合法”居民身份证和组织“临时家庭”。陈嘉庚化名李文雪，在户口簿和税单上注明李文雪前在泗水住过，是数年前迁来的当地老居民。陈嘉庚原来留了几十年的胡子，现在只好割爱剃光。平常常穿的西装，也换成印尼百姓服。李文雪和校友们住在一起，共八口，有男有女，有老有小，俨然成了“一家人”。

采取以上措施后，总算有了一层临时“保护伞”。但隐居生活不是短期的。校友们出于高度责任感，唯恐对校主保护不周而发生意外。加上已经多次出现险情，心里压力就更大。比如有一天清晨四点，日本宪兵队突然在巴兰街四号屋“砰、砰”敲门。黄丹季十分紧张，但又非开门不可。宪兵进门后大喊：“荷兰人！荷兰人！”后来又有个印尼人在后面喊：“错了，不是四号屋是二号屋！”原来他们要逮捕二号屋的荷兰军医。虽然后来宪兵走了，但人们余悸犹存。类似情况多次出现后，校友们更加坐卧不安，忧心忡忡。陈嘉庚却泰然自若，从容对付。但

也很理解校友们的心情，一再安慰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夭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作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我即一死谢祖国。因此，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几句肺腑之言，既体现了陈嘉庚的浩然正气，也教育了在场校友。

(三)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避居玛琅期间，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嘉庚，在生活上每天仍然坚持：早睡早起，做健康操，早晚散步，三餐从简，实行三不（不吸烟、不饮酒、不喝咖啡）。有时校友们想给他加点菜，他总是不肯接受。说现在是战时，物力维艰，要多为前方抗日战士和后方受难灾民着想，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为好。

陈嘉庚胸怀大志为国为民，在匿居“晦时园”期间，闲来无事，遂动起写回忆录念头。他想，自己对国家、社会无甚贡献，加上幼年辍学，学识肤浅，很少提笔记述，直到1940年回国考察，思想急剧转变，才暗下决心，想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详细记下。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延搁，未能成篇，感到遗憾。现在又想，这次国难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贡献如何，他们辛苦募捐，同仇敌忾，抵制日货，惩治汉奸，不惜牺牲，数年如一日，自己作为南侨总会主席，情况最清楚。因此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和回国考察见闻，记述下来，公诸于众，传诸后世。目的不是为了颂扬自己，而是为了介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卓越贡献。

陈嘉庚深知，写回忆录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写华
助抗战，涉及许多具体数字；写回国考察，又连带许多具
事实。现在手头上又没有什么资料可参考，与外界也已隔

绝，无处查询，困难不少。不过，好在这些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虽时隔多年，尚记忆犹新。只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总有写成之日。

避难期间，撰写回忆录，难度不小，风险更大。一旦被敌人发现，白纸黑字，真凭实据，马上露底。不仅写作会落空，秘密更难保。校友们也总是放心不下。有一天陈嘉庚正在埋头写回忆录，突然有两个日本军官闯进来，大声嚷嚷要喝咖啡。陈嘉庚闻声，赶紧将稿子塞在床垫下面，待日本人站在房外顺便观察房内动静时，见有个老人坐在摇椅上安详地在看古书。屋主人告诉日本人，这是他叔叔李文雪，耳朵聋，听不见。日本人消除了疑虑，喝过咖啡就走了。随后陈嘉庚又在埋头撰写回忆录。

隐居玛琅晦时园期间，陈嘉庚除了看书（主要看历史书，如《通鉴易知录》，反复看了七、八遍），看报（日本人办的《共荣报》，从中可以揣测一些外界动态和时局发展趋势），其主要时间都用来撰写回忆录。从1943年3月动笔，到1944年4月脱稿，全书共计三十余万字。记述内容以华侨援助抗战和回国考察见闻为主。倾资兴学及避难爪哇之事写的较少，兴办实业之事提得更少。后来陈嘉庚考虑到自己一生是兴办实业在先，而后才有能力服务社会，再后才有资格领导华侨援助抗战，所以接下去又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将在南洋兴办实业过程，写成《个人企业追记》，共计50节两万多字，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陈嘉庚避难爪哇已两年多，撰写回忆录也花去一年多时间。这时太平洋战争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联军的合力打击下，日寇已转攻为守，处处挨打。但敌人不甘心失败，犹在垂死挣扎，孤注一掷。在爪哇各地敌人强令数万劳工在挖战

训练和大量招募新兵，并日夜操练，战争气氛有增无减。身处逆境

的陈嘉庚，在校友们细心掩护下，虽已闯过许多险关，但是“天快亮，更黑暗”，其前途安危仍然未卜。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早就打定主意，万一哪天被捕，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无在敌人面前低头之理。为此，他身上一直秘密藏着一小包“氰化钾”，准备必要时以身殉国，以保民族气节。同时，他还心胸坦荡地在晦时园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作为回忆录的结束语。诗中写道：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愧偏甫萌芽，首予劝诫勿昧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岛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掳，抵死无颜诤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吉凶如有定，付之天命惧奚益。

(四)

陈嘉庚对这次抗日战争的结局早有预言，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后胜利必属我”。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开，普天同庆，万众欢腾。隐居三年多的陈嘉庚更加开心。人在玛琅，心已飞向新加坡，飞向祖国。但是恢复交通有个过程，因此又不能太性急。

9月30日，陈嘉庚离开玛琅前夕。在玛琅的十几位厦大、集美校友相约为校主送行。并希望临别前夕多听听其教诲。陈嘉庚深情地说：“这三年多，蒙诸位冒着生命危险照顾我，内心

感激之情，不是语言所能形容。俗话说，“大恩不能言报”。我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前途顺利。接着又说：“日本投降了，我明天就要起程回新加坡了。希望你们要继续为华侨教育事业出力，还要帮助印尼独立，这些都是有深远意义的工作。玛琅是个好地方，日后我有机会再来看你们。”陈嘉庚的临别赠言，言简意赅，语重心长。

翌日，陈嘉庚在黄丹季、郭应麟等校友陪同下，乘汽车经泗水，再乘火车到吧城（雅加达）。一下火车，当地许多华侨和印尼人士前来迎接。大家兴高采烈，相互祝贺。陈嘉庚和庄西言一见面更是热烈拥抱。两位挚友，分别三年多，今日重逢，像作梦一般。与三年前相比，庄君显得消瘦、憔悴，料想是受尽折磨和苦难。为此陈嘉庚感到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直到现在，陈嘉庚才知道，庄西言三年前已身陷囹圄，被敌人要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多次昏迷吐血，却未曾吐露陈嘉庚的半点实情。后来庄君已奄奄一息，才由家人变卖全部家产赎回，他现在的住房，也是由华侨集资帮助赎回的。当晚，陈嘉庚哪儿也不去，就专心住在庄西言家中。两位挚友要好好叙谈叙谈。真是疾风知劲草，患难情更深。

10月6日，陈嘉庚由吧城返回新加坡。陈嘉庚安全脱险消息，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海内外爱国同胞和侨胞的心。不久，新加坡500个社团联合召开盛大的欢迎集会。11月18日，重庆10个团体又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大会堂里，贺辞满壁，到者盈门。会议气氛热烈，掌声迭起。毛泽东送来的一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条幅和周恩来、王若飞送来的“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非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祝辞，最引人

注目。冯玉祥的“丘八诗”，“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眠”。特别为人所欣赏。此外陈立夫等个人和团体也送来了贺词或对联。

参加重庆安全庆祝会者共500多人。许多社会名流如郭沫若、黄炎培、邵力子、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都来了。而且“都是自己来的，不是拉来的”。大会主席邵力子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郭沫若代表文协前来庆祝陈先生的安全。郭沫若的一席有血有泪的发言，几次为热烈掌声所打断。新加坡和重庆各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的先后召开，表明祖国儿女与海外侨胞总是心连心。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事务异常繁忙。几个月来他一直关注在重庆举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关注华侨战时损失和战后团结，关注华侨与侨居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同时挤出时间，将《南侨回忆录》一书加以增补、充实。1946年初又重新撰写了战后经历的近20件大事，作为“战后补辑”列于书后。还着重写了一篇份量很重的《弁言》列于书前，使《南侨回忆录》更趋完善。书稿请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厦大教授林惠祥为之润色后，首先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出版发行。

陈嘉庚的巨著《南侨回忆录》出版发行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和欢迎，它曾经一版再版，供不应求。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后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阅读该书后，认为：“没有比这部著作更丰富更有魅力了。”前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生前好友张国基说过，陈嘉庚先生在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在海外是两部最受

海外华侨欢迎的巨著，两部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华侨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些，因为华侨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

二、陈嘉庚领导华侨 支援祖国持久抗战

抗日战争是我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基础上，包括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参加的全民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胜利。换句话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曾经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种情况，在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一书中，也有许多具体和生动的记载。

(一)

早在1923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5月3日，日本派兵侵占济南，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被推举为会长，并向华侨募捐130余万元，救济山东受难同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履行各种国际公约，维护世界和平。并联络新加坡华侨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南洋各地华侨纷纷集会或在华文报纸上写文章，强烈谴责日寇无耻的侵略行径。并向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东北马占山部队，和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示